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走向亚洲的航踪

第二章

尾崎秀实与中国

一 序 言

从左翼的立场上来把握支那,完全使我迷醉了。对于我,并非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激发了对支那问题的关心,而是相反,是支那问题的现实,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心。我即处于这种关系之上。(《尾崎秀实著作集》,劲草书房版第4卷第296页。以下引用《著作集》者,仅标明其卷数)

尾崎在最初的《呈报书》中,写下了上面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尾崎真实的内心表白。1928 秋天,作为《朝日新闻》的职员赴任于上海支局以来,至 1932 年 2 月回到大阪本社,在整整三年多的时间内,尾崎以上海这个国际都市为据点,亲身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当时,国民革命,即所谓的“北伐”(1926 年 7 月)的波澜,虽然因蒋介石挑起的“四一二”(1927)而呈现退潮的趋势,但是,以江西、湖南为中心,革命的新运动已经开始。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揭开序幕,正是尾崎去上海赴任的前一年。在尾崎滞留上海期间,耸动世界耳目的红军占领长沙事件发生(1930 年 7 月),遵照“李立三路线”(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而发动的这一起占领长沙事件,虽然仅三天就告于结束,但这一事件确实让人感觉到了在中国的大地上正在酝酿着一场地壳变动般的风暴。尾崎就是在“毛泽东路线”形成期的那数年间,在中国现场,全身吸取了这一时代的风潮。另外,在同时存在着革命与反革命的上海,他加深了与史沫特莱^①、左尔格^②等左翼阵营的交往。与他们的交往,作为其结果,十年后,发生了“左尔格事件”^③,与之相关的一些历史过程,在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再加说明的必要了。

① Agnes Smedley, 1890—1950, 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 长期滞留于中国, 从事革命报道。——译者注

② Richard Sorge, 1895—1944, 德国人。——译者注

③ 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以将日本政府的机密、日本国内的形势及驻日德国大使馆的秘密泄露给苏联之疑, 1941 年 10 月, 与之牵连的德国人左尔格、尾崎秀实等人被捕处刑的事件。——译者注

众所周知,尾崎回国后,作为中国问题的专家,非常风光地登场了。卢沟桥事变的前夜,以及日中展开全面战争以后,尾崎在日本社会里所占有的地位,首先就是目光敏锐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站在这一位置或地位之上,以《朝日新闻》社为后台活跃着,参加了“昭和研究会”,成了“近卫内阁特别顾问”。作为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尾崎,他当时的一些论述,确实有使人大开眼界的地方。在西安事变的第一报传到日本的那一天写下来的评论,其准确的预言,使得他自己的名字从此深深地印刻到了人们的头脑中。他的论文、解说,在国际政局十分微妙并且极度紧张的这数年间,一直为外交舆论投下了重要的一石。有心的人,会被他的提问所唤起。他对时势的洞察分析能力,也将他自己推到了政策制定的中枢机构。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尾崎的中国问题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他工作的核心,而且形成了他的人格。这样说,我想并不过言。这里,通过对尾崎的研究方法、视角,与中国现实的交锋等等的探讨,尾崎其人以及通过尾崎这个人所映照出来日中关系的现实的一个侧面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尾崎其人以及他的历史意义。

尾崎的中国研究以及通过研究得出来的预测、建言,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与性质呢?我想以这一问题为线索,对尾崎的思想与行动,还有他的历史地位加以若干考察。

二 中国研究的方法论

尾崎首先指出了当时的中国研究中“缺乏科学的方法论”。在这样的研究状态下,尾崎自己具体地从“国际关系”以及“民族运动”这两个视角来观察、分析中国,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中国分析。这些事实,已经多次指出过了。尾崎的中国分析,至今,我们再次阅读时,都会被他的透彻所倾倒。尾崎的文章非常明快,就是在这些明快的语句之中,蕴含着极强的说服力和尖锐的洞察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原来的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缺陷,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判。在他的批判背后,确实对自己在中国的亲身体验——“从左翼的立场上来把握支那问题”,“支那问题的现实展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充满着信心。

例如,尾崎说:

在日本,并不是不存在着支那研究,倒不如说反而应该为所谓的支那通过多而担忧。……这些支那观,总体来说,应该说都是“东洋”史的史观。……今天,在支那研究中,成为一大问题的,那就是科学方法的缺少,亦即支那论中方法论的欠缺。(《处于暴风雨之中的支那》自序,第1卷第3页)

不用说,要从根本上理解日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

点不得不放在对经济、社会诸问题的阐明上。……我想，我们要究明日支关系，应该排除观念性的方法，遵从与经济、社会相关的具体方法。（同上，第1卷第62页）

这里，被称为“科学”的方法，无须多言，就是从“左翼立场”来认识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尾崎的这种“与经济、社会相关的具体”分析的基础，在他的《现代支那论》（收载于第2卷）中，从对支那社会的两大特性，即，“半封建性”和“半殖民地性”的分析中，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尾崎对这两个基本“特性”的分析，不是从别的方面，而是从“国际关系”以及“民族运动”这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从“支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中，导出了“支那与列强资本”的问题，从“半封建性”中，导出了决定“现代支那动向”的“民族运动”的问题。这两者密切相关，形成了“相辅相成关系”。只要对尾崎的论文、解说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感觉到，“国际关系”与“民族运动”这两个视点，其实即使在非常短小的不起眼的时评中，也是极其醒目的。如果把话讲绝一点，这两个分析问题的视角，其实贯穿于他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全部著作之中。

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现代支那”的“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这两个特性本身，在当时的“左翼阵营”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定义。大凡是以“对支那社会进行科学性解剖”来标榜的论著中，都泛滥着这一类的用词。还有，像“国际政局”、“民族运动”这样的遣词，其本身都未免过于通俗，在那个时代甚至已经可以将之视为陈词烂句了。但是，尾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两个基本定义，基本视角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运用自如地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活分析”。换句话说，以

上的这些用语，恰如是他自己创造并将之定型的那样，从而，也使他的分析方法充满了独特性。这样，尾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即使部分地与他人相同，但这并不是他单纯地引用“共产国际理论”或机械地运用阶级分析的结果。因此，他的分析过程与结果，与其他的左翼阵营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

这里，在尾崎的中国分析中，对其令人吃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研究，我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是怎样理解的，对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是一种什么理论，我觉得，尾崎的现实主义精神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以上这两个层次，形成了他自己的思考方法。

例如，在日中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南京政府面临着撤往重庆的局面，尾崎针对这一局势，这样写道：

使政府从上海南京一线往内地撤退一事，对蒋政权而言，实际上并非容易之事。……撤往内地的同时，蒋政权变质——落入共产党的影响之下——是可以预想得到的。与蒋政权保持着绝大利益关系的列强以及作为蒋政权支柱的支那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浙江财阀，他们对这一关系是不可能没有想到的。因此，他们将会拼命地与蒋政权加固关系。这一通常的预测未必没有道理。但是，现实中，在我们所能看到之处，这种努力，不管是哪一方，几乎都未有任何表示。

这是为什么呢？尾崎分析道：

浙江财阀的消极态度,首先与上海承受了极大的经济打击是分不开的。

这一打击,其性质,可以说是几乎夺去了浙江财阀的发言权。

站在列强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停止调停之事确实存在。……然而,列强内部尚未取得共同步调,恐亦是理由之一。

列国从其利害关系来看,当然应该防止战争之扩大,然而却无所举动,或无法有所举动。其最大理由当归于支那民族运动的方向之决定,伴随着这一巨大的压力,已经开始有所动静。

然后,他的结论是:

此加速了支那近代历史赋予的民族解放的要求,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作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和国民政府的势力所难以控制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了。(《蒋政权的衰退与新政权的前途》,1939年2月版第2卷第323页)

尾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虽然仍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到其意识不明确的地方,但是,就我个人所知,他的这种分析,在当时的各种论说中,仍然是出类拔萃的。在这里,决定战局、政局的基本要素被极其简洁、准确而且毫无遗漏地揭示了出

来。在尾崎看来,蒋介石政权的重庆撤退一事,非常明显,会带来政权变化的可能,蒋介石政权本身当然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尽管如此,蒋介石政权还是果断地采取了撤退这一路线,而且,与之有着密切利害关系的列强,几乎没有挽留之意,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在这里登场的是复杂的国际政局的变化以及另一个最大的因素,即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华民族运动的力量。尾崎在这儿叙述的观点,决不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情报才能得出来的观点,而只是从万人瞩目、不言自明的“蒋政权内地撤退”这一现实中得出来的。这一分析,我们几乎可以将之视为他的历史认识、现状分析的方法论的典型。

不仅仅如此,他的认识方法,时不时地能让我们觉得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模特儿。例如,《现代支那论》中,有这样一段:

只是含糊不清地认为英国在支那所占之势力非常之强,所以对英国必须如此这般的议论、主张,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应更具体地、彻底地察知英国对支那的历史性地位、其现有势力、与支那交往的方法,或者其势力浸透的特殊性,并且将之与世界形势变化相结合,推测其政策在今后向什么什么方向转移,从而,我们也不得不在什么什么方面通过什么什么方法来进行对应,只有这样,或许才能树立妥当的政策。如单单停留在对英国势力之强大进行实证的阶段上,那么,甚至会因此得出必须打倒英国势力和必须与英国协调这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来。(《现代支那论》,《支那社会的两大特性》,第2卷第201页)

事实上,贯穿于尾崎《现代支那论》中的,不是单纯的阶级分析、历史发展规律这一些方法论,确实能让我们感觉到“活”分析的样子。他对历来的“支那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之为“缺乏科学方法”,同时,他更强调的首先是所谓的动态分析。他说:

科学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实验不能停留在显微镜上,也决不能是尸体解剖。对活体的解剖,比什么都必要。即使在一向长期处于假死状态的支那,事实上还保存着活力,而且,新的运动规律对之起着作用。(同上,自序,第2卷第195页)

使尾崎充分发挥这一分析方法的,大概可以说是针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问题的分析。尾崎对中国的民族运动的重要性,反复加以强调,同时,他对那种机械的、片面的分析,自始至终地加以了恰如其分的批评。

现在,看到这一民族战线的团结意外地巩固,有些人就说,支那民族运动完全消除了各阶层的利害,我觉得这是与事实相反的机械性看法。(同上,《民族运动的特质》,第2卷第271页)

于支那内部,统一战线不是均质的东西,而是极其不均衡的结合,无宁可以将它看作是包含着各种矛盾,这是极其不均衡的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努力寻求平衡,努力希望结合的一种形态。(同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

系》，第2卷第281页)

如果仅从尾崎的语言上来说的话，排除机械的分析论，追求全面地、整体地把握，这些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贯主张。如果再跳跃到另一个侧面来看，当时，再三强调这些方法论的重要性的，可以说不是别人，正是担负着统一战线一端的毛泽东。（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希望，那就是想确认一下当时尾崎对共产国际、中共关系的文书以及毛泽东的论文收集、阅读的情况。高田尔郎氏曾经说过，1941年，作为“日森情报”的一环，他将译成日文的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亲手交给了尾崎。——《尾崎秀实与日森虎雄》，《现代史资料(2)左尔格事件(二)》附录《现代史资料月报》，三铃书房版。)

当然，不用说，知道这一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应用这一分析方法，完全不是一回事。作为新闻记者，尾崎的“直觉”是很有名的，并且据说他自己也对自己的这一“直觉”充满自信。或许可以这样说，这种分析方法，与他天生的素质相结合，更加得到了洗炼，在激烈的政局舞台上，充分地将自己的才能发挥了出来。

在这里，我们要探讨尾崎的中国研究乃至中国认识的特质，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只能从他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科学方法”，即超人一等的现实主义手法中来寻求。但是，当我尽可能将尾崎数量众多的论说放在当时的形势下加以通读时，觉得要将尾崎的所有特质全部放在这种“方法”中来寻求其独特性的话，仍然是不可能的事。直率地说，至少对于我，是被某种难以名状的为难和奇妙所纠缠着的。就像最终与左尔格

事件相牵连的那样,在尾崎的内心,基本上还隐藏着另外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如果极其简单地说,尾崎反复指出的“支那民族运动”,为什么他就能将之紧紧抓在手上进行明彻的分析,而别人则完全视而不见或只是触其皮毛呢?或者即使已经看到了“支那民族运动”的发展,而却又是为什么只是用公式化的、教条主义的眼光来观察呢?尾崎的中国认识,不正是他理性与感性这两方面的结合吗?尾崎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起点、终点,以及他的分析之所以与其他几乎所有的中国分析都存在着质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一个亲自触摸了中国民族运动的人的触感上。这种触感或许可以用“黑压压地出现在眼前的民族运动”这一存在来表现。尾崎自己将之表现为“支那的正体”(《现代支那论》自序),而且也完全抓住了这一运动的本质。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他自己的感性而获得的。

当我们设定了这样的问题来考察尾崎时,其决定性的体验,当然是三年多的上海生活。尾崎的这一段经历,是无人不知的事。在这个期间,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支那民族运动”中去了。尾崎为林守仁—山上正义翻译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 阿Q正传》(四六书院 1931年版)所写的序文《说中国左翼战线之现状》(第3卷第269—273页)之中,正如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迸发出了自己的感情。若从人生的经验、人生的前进道路这一点上来看,为之作序这一体验,对尾崎来说,成了一个重要的命运之举。跟几乎所有的人一样,人生中的偶然与必然微妙地交织在一起。我觉得尾崎在上海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不仅仅只是贯穿其个人一生的事,而且还成了他分析、预测中国的动向以及决定日本的前进路线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他在上海的体验当然是他固有的东西,而调动自己的理

性与感性,在上海获得的中国认识,则更属于他固有的财产了。正是通过了这种认识,他才确实实地窥见到了“现代支那的正体”,说得更广一点,窥见了 20 世纪亚洲的秘密。

直率地说,我在读尾崎的文章时的一个难以抑制的感觉是,他想将他自己体验到的正体和秘密向世人传播,但在当时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形势下,却又不能畅快地完全将之传播,在这种急不暇待的心情下,显得有点焦躁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各种场合,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他的“支那民族运动”,以此来唤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只要是运动,那么,它的实际形态就只能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尾崎立于“民族运动”这一原理性说明与运动的令人吃惊的多样性以及瞬息即变的运动实态的夹缝之间,在自己都尚未能够充分确定的正体面前,不断地苦闷着,彷徨着。

这里,如果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可能包含着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个是,尾崎通过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被“民族运动”,特别是“运动”这一存在形态深深地吸引住,并将之吸收为自己自身的思想。若从他大量的与中国相关的评论来看,他的主张,如果大胆地说,那就是“别看政权,请看运动吧”,或者也可以说是“别看制度,请看运动吧”。在不断地评论南京政府、蒋介石政权的过程中,他的这种视点,跃动在每一个角落。在不断地指出这个政权所拥有的某种强固性与脆弱性时,最后所展示出来的形象,仍然是席卷中国的“运动”——“民族运动”。下面我们将要看的一段话,或许是反映他的这一观点的最生动的一段。卢沟桥事变半年前的 1937 年 2 月,尾崎在论及“支那与苏联”的文章中说:

国民政府立于高涨的民族运动之浪尖,想一举完成国内统一事业,对外也有着巨大势力的后盾,得以主张获取某种地位。但是,问题是国民政府自己不具备领导或控制这一昂扬的民族运动潮流的力量,仅此一点,若有一步走错,则大有从浪尖波头被摔落下来的可能性。(《处于暴风雨之中的支那》,第1卷第47—48页)

这一潮流,代表着“不断发展的支那民众的动向”,更加具体一点来说,这一革命的主力军以“一向盲目连方向都不知道而却以惊人之顽强在这块土地上营营而生的支那民众的形象”(同上,自序,第1卷第4页)表现出来的。以“游击队不用说,一切的政治势力与采取不协同态度的只知面对土地的农夫以及街头衣衫褴褛的少年”(《东亚协同体的理念与其形成的客观基础》,第2卷第312页)的形象表现出来。

另一个问题则是,据尾崎的看法,这一民族运动的本质,首先具有“自己解放”的性格。自己解放自己,才是这一运动的实质。严密地说,这一句话,在尾崎的著作中,仅仅偶尔一见,因为是仅仅偶尔一见,所以在著作的整体中不易被觉察。但是,毋庸置疑,这一定义,才是尾崎把握民族运动,更广泛一点来说,是尾崎思想整体中的一个关键。芦沟桥事变一发生,尾崎就写道:

我觉得支那的“赤化”已是难以改变之趋势。……这是与支那民族运动中命中注定的自己解放这一事实以及今后来自外部的日益增大这一事实相关联的。

支那的“赤化”，是由支那特殊的复杂性及特殊的内容决定的，我想不一定就非要将它考虑成是与苏联同类型的东西。也不能说今后再次惹起国共两党分裂的可能性就没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赤化”倾向仍是在所难免。（《从国际关系看支那》，第1卷第197页）

然后，正是在这种规律性之中，虽然话讲得比较委婉，尾崎仍然给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下了结论：

现在，不难想像共产国际与支那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然而，支那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热情，并不单是根据这些指令关系而形成的。经历了1925至1927年的联合，他们之间似乎有着更加本来的、独立的的东西。从中国共产党、军队现在的指导部的人物来看，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周恩来、贺龙、刘伯坚等将领，无一人访问过莫斯科，全是从斗争中走过来的人。这些人中间，自己的妻子、眷属曾被国民党杀死的人亦为数不少，然而，他们仍然尽力地与国民党提携着。（《现代支那批判》，第2卷第117页）

在尾崎这样的笔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细腻的观察方法，即，对“自己解放”自己为目标的中国民族运动——担负着主要的一端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理解、把握，不是从所谓的“规律”、纲领，而是从人性以及其行动上来寻求事物的本质的。

以上，我对尾崎的中国研究的独特性，以及其研究乃至认

识中的本质的方面进行了阐述。我觉得,在他的分析方法中,与现实主义精神同时,还根据事实本身,将“支那民族运动”的基轴视为“自己解放”,在真正的意义上作了尽可能完整的发现和认识。如果将这一点视作尾崎的现代中国研究的精髓的话,绝非过言。

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加以说明的倾向,这就是,对中国的民族运动,在近代日本,尤其是在明治末期大正以后的我国,是人们最终都没有能够完全把握的问题,到了昭和初年,甚至可以说发展到了日本人几乎不可能理解的地步。对明治宪法体制——天皇制国家确立以后的帝国臣民来说,这种意义上的“民族运动”,是绝对难以理解的。这种不理解由来于从富国强兵走向对外侵略的近代日本内在的最根本性的深层。这期间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回到尾崎个人身上来说,正是从这儿,开始了他悲剧性的、绝望的努力。这以后,在日中全面战争的过程中,尾崎的生活、斗争,与参加权力的中枢机构,参与“东亚协同体论”,最后与左尔格事件发生牵连这一系列的问题迅速地牵扯到一起去了。

三 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与日本的构想

在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一年多的1938年11月公开出版的《现代支那批判》的自序中,尾崎写道:

至战争爆发之前,笔者的态度是一心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向国人警告日本所面临的重大事态。然而,在事变朝着大规模发展以后,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当然必须是更积极。在最近的论文中,虽然尚未达到充分的积极与具体,但是,读者肯定能看得到,我们正在不断地从所谓客观主义中摆脱。(第2卷第1页)

被收入《现代支那批判》一书中的,大致是1937、1938这两年间撰写的时局评论。在战局、时局的急剧发展中写下来的这些论文,正像尾崎自己所说的那样,确实带有比现状分析更强烈的“从所谓客观主义中摆脱”的调子,更加准确地说,是飘荡着一种浓厚的被逼得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感情或情绪。《现代支那批判》,正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由《支那政治批判》、《日支时局批判》、《支那经济批判》三章组成。其中,《日支时局批判》,以从芦沟桥事变至“汉口攻击战”为止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发展着的战局为背景,因此,充满着明显的迫切感。

然而,尾崎的这一论集中,他想批判什么呢?或者,在“日支时局”的发展中,他尝试了什么样的批判了呢?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要批判“现代支那”,是要站在日本的立场上来批判“支那”的“政治”、“经济”。但是,这本书中,却隐藏着极其曲折的意图。

尾崎在“‘局部性解决’、‘不扩大方针’都完全不被理会”,“国民的大多数只知道向敌人突进,少数的软弱者对事态的趋势毫无主张,只是呆然怅惘的形势下”(同上,第2卷第66页),对事件的深刻化作了准确的预测。